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於1990年10月創刊，迄今出版凡三十三載。今年12月號迎來出版第200期的里程碑，謹藉此機會向多年來一直支持本刊的編委、作者和讀者致以由衷的謝意。敝刊一如以往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共同探討關乎公共性、思想性的學術文化議題，推動未來中國的文化建設。

——編者

## 重要轉折時代的人物研究

文化界知識人在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的身世浮沉與個人際遇不僅是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主題，還牽涉了文化與政治之間糾纏複雜的關係這般永恆的議題，因此長期吸引研究者與讀者的關注。魯迅曾提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宮陳〈依違之間——晚年張元濟的認同和尷尬〉（《二十一世紀》2023年10月號）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作者通過對豐富多元的史料進行辨析，對張元濟晚年的行事言說作出細緻到位的解讀，用具體的史事細節一改既往研究對張元濟評價標籤化的現象，還原了一

位處事應變得體、政治選擇與個人命途緊密結合的「文化老人」的豐富面貌，為知識群體與新政權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一重要議題提供了新的考察視角與生動案例。

正如作者在文中強調的，對於張元濟這樣屢經政局變動、身兼傳統文人習氣與現代商人頭腦的社會賢達，其政治選擇、政治參與及必要場合的表態行為，非用「政治投機」等簡單定性評價即可一筆概括，背後無不體現出張元濟立足具體時勢、鑒於公道私誼所作出的政治考量，「應付一切，無論對內對外均非易易」。作者用具體的事例有效還原了張元濟的政治因應之道，如第一節對張元濟推辭參加新政協會議所開列理由的逐條分析，在內容上直接反映出張元濟以退為進的文人風習與忖度時局的政治智慧，而辨析材料的過程體現出作者對史料批判性利用的職業素養與對是時政治語境的熟稔，從而避免以人物自身視角就事論事的局限。第二節以張元濟對江南地區徵糧與土改政策的處理態度與種種表現為例，生動反映張元濟在經濟賑與政治賑之間、人情私誼與公事法理之間權衡利弊後的抉擇。第三節敏銳地挖掘張

元濟在公開表態與私人對話中對「三反」運動的認知表述差異，顯示出張元濟對新政權治理模式和政策的隔閡與逐步調適。以上諸例無不揭示出歷史人物在具體歷史語境中言行的複雜性。

宮文提示我們，對處於重要轉折時代的人物研究，仍有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必要與空間。

趙帥 上海  
2023.10.24

## 國家如何通過體制吸納知識精英

葛兆光先生說過，日記、回憶錄、劇本、小說等，是重構思想「歷史」的重要資料。清末以降，撰寫日記成為風尚。日記作為第一手文獻，可以幫助研究者迅速進入歷史現場，理解歷史情境，甚至重構歷史敘事。

林盼博士大作〈新中國對舊知識精英的吸納——以蔣維喬為例〉（《二十一世紀》2023年10月號），圍繞蔣維喬私人日記，具體而微地呈現新中國政治吸納政策的形成及其演變，為「社會主義新人」研究提供生動的示範。二十世紀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改革、重塑個人的思想、道德和行為模式，從中創造新的人格。既有關於社會主義新人的討論，側重於國家如何通過制度塑造人民，包括藝術、文學和宣傳中的新人形象。像當時蔣維喬這樣的高齡、舊式知識精英，其思維有

沒有被改造成功，這篇論文揭示了冰山一角。

林盼基於私人日記討論國家政治吸納，有別於「扁平化」的意識形態說教，生動揭示了被吸納者內心的活動。《蔣維喬日記》表明，知識份子十分看重政府的「回應性」，說明他們要求「獨立」而非「對立」，具有主動認同、吸納的可能性。那麼，怎樣理解政治吸納的有效性，到底是體現在行為表達，抑或心理層面？《蔣維喬日記》屢有對開會者「言繁詞複」的嫌棄，到底是因體弱多病產生的生理不適應，還是內心的不認同？據筆者考察，以他與梁漱溟的關係為例，1919年第一次閱讀梁漱溟作品時，即對梁漱溟抱有好感；1921年經梁啟超引見，與梁漱溟首次見面；1955年梁漱溟來滬訪友期間參與接待，閱讀《中國文化要義》時認為梁漱溟「思想深刻，真可讚歎」；轉年開始閱讀〈批判梁漱溟的哲學思想〉，但並不影響蔣維喬去北京約梁漱溟同遊。雖然蔣維喬在日記中下筆克制，仍可以推測他為人處世的風格，未必亦步亦趨於時代變化。

《蔣維喬日記》跨度長達六十多年(1896-1958)，寫作時間涵蓋二十世紀前半葉。葉舟教授以「過渡時代」的知識份子來概括蔣氏1903至1911年間在上海的活動。當然，以他一生的經歷來看，這種「過渡時代」的邊緣人意識似乎長存。期待林盼以這篇論文為引子，開啟對蔣維喬的全面研究。

李甜 合肥  
2023.10.28

## 毛澤東著作傳播中的「本土因素」

新近十來年，關於毛澤東的研究似乎再次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熱點領域。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教授生前領銜編輯的英文版毛澤東著作集《毛澤東通往權力之路：革命文獻，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在數位學人接續努力之下，於2022年終成十卷全璧。海內外學者接連奉獻研究佳作，筆者即從石川禎浩、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藍詩玲(Julia Lovell)、庫克(Alexander C. Cook)等學人的著作中獲益良多。早已化為現代中國標誌性符號的毛澤東，對其研究的冷熱狀態，無疑均傳遞着政治和社會的某種消息。史料的進一步發掘，亦是毛澤東研究步入新境的推動力之一。與此前毛澤東研究的學術取向不同，前述學人明顯(多數是十分自覺地)受到史學新潮流的影響，從解構經典、全球史等角度切入毛澤東研究，在考證生平事迹、闡釋思想變化、梳理著作版本之外，直擊毛澤東敘事的形成過程、毛澤東著作的全球傳播等重要議題。

曹嗣衡〈《毛澤東語錄》在日本的傳播初探〉(《二十一世紀》2023年10月號)一文亦可視為前揭研究趨勢中的一篇代表作。曹文在系統梳理《毛澤東語錄》日譯本版本、銷量和傳播方法的基礎上，重點剖析了《語錄》在日本傳播的動因。作者認為，《語錄》在日本一度流行的主因，並非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動輸入，而是日本民間對其積極接受與主動傳

播。具體而言，在社會公害問題嚴重化、人心空虛墮落的背景下，《語錄》被日本民間賦予三重角色：鼓吹革命的政治讀物、了解中國的知識讀本、經營商業的管理秘笈。1972年以後，隨着中日兩國各自重大政治事件產生的影響，《語錄》在日本傳播的熱度明顯退去。

曹文着力從日本社會自身尋找《語錄》傳播的動因與軌迹(或名之為「本土因素」取向)，充實了《語錄》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全球傳播的圖景。順此思路，延伸討論如下三個問題或亦有意義：其一牽涉書籍史研究的方法論。《語錄》既然在日本一度流行，則從閱讀史角度搜集日人閱讀、引述、化用《語錄》的資料，並進而分析讀者閱讀實況和《語錄》在眾人眼中的各色形象，就十分必要和存在可能條件。其二為傳播的史實問題。《語錄》並非驟然降臨於日本社會，此前的毛澤東著作如何在日本傳播，實則奠定《語錄》傳播的渠道、心理和思想基礎；此間面對作者分析的傳播土壤，《語錄》亦非孤立存在，其傳播命運正是在與同時期其他相關讀物的競爭中形成的。其三是思想層面的議題。無論商業以及其他功利因素的作用如何重要，也要看到《語錄》在同時代的書籍中具有形制、語言和思想倫理的衝擊力等諸方面的特殊性，這些特點使其在傳播中別具吸引力。《語錄》在東亞以外地域的傳播恰可與之形成比較，日本社會在戰後的東亞認同、儒學氛圍以及倫理觀念，都是認識《語錄》在日本傳播的極為重要與特殊的「本土因素」。

黃江軍 北京  
2023.11.2